

【论 文】

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国际文献综述¹

王振宇、顾昕²

摘要：文章系统地回顾了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国际文献，并发现，虽然大多数研究支持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随着研究对象、研究层次、指标度量的不同，结论会出现分歧。对文献的进一步梳理发现，生产性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族群冲突导致的国家失败和腐败等被认为是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影响机制，同时，制度和规模也是影响族群多样性起作用的约束因素。文章最后指出了目前研究成果面临的挑战：一、指标变化对结论的影响；二、内生性问题；三、影响机制研究的不够深入；四、族群多样性概念本身仍需细化。并给未来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族群多样性；经济增长；影响机制；政府失灵；民族政策

在经济学中，对多样性（diversity）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领域。任何一个特定范围内的人群在诸多人口统计指标（demographic indicators）上都会呈现某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倘若某些指标的异质性大到一定程度，那么该人群之中便会出现一些可辨识的亚群体，从而产生多样性。

作为分析单位，这里所谓的“特定范围”既可以是地理性的，也可以是社会性；既可以大到国家，也可以中到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如城市）或不同的经济部类（如产业）或不同的社会界别（如教师或管理者），小到社区、村庄、宗族、家庭、组织以及组织内的更小单位（如大企业的分公司、教育机构中的班组或院系、协会中的集体会员等）。

众所周知，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而“经济人的人群”并不具有多样性。经济人具有某种同质性（homogeneity），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者，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穷人还是富人、有工作还是无工作、白种人还是有色种人、信上帝真主还是拜神求佛。

当然，经济学家不会不知道现实世界中的人并不等同于经济人，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并不考虑个体所属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对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意义。

但近些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以群体为基础的偏好异质性（the heterogeneity of preferences）对微观经济活动（譬如储蓄和投资）及其宏观结果（如经济增长）的影响（Leff and Sato, 1993），并取得了相当广泛而丰硕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以各种方式开始处理经济主体的多样性问题，包括性别、阶级、种族、地域、国籍、语言、信仰和风俗之别等。

在这里，我们仅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及其合作者提出的“认同经济学”（identity economics，又译“身份经济学”），认定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自我感觉和认知（即“认同”）会对其效用函数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包括经济活动在在内的人际互动（Akerlof and Kranton, 2010）。认同经济学致力于把各种认同因素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对诸如工作场所的歧视、教育不平等、贫困、社会排斥、劳动分工、失业等社会经济现象加以解释（Akerlof

¹ 本文刊发于《制度经济学研究》总第54辑，2016年第4期，第1-16页。

² 作者：王振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顾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and Kranton, 2000; 2002; 2005)。

族群多样性 (ethnic diversity) 是经济主体多样性的一种体现。在当今世界, 不仅单一族群国家或许早已不复存在, 而且族群多样性还呈现在地区、社区 (社群)、组织甚至家庭之中。族群多样性通过族群认同的因素, 引致偏好异质性, 影响着个体的微观经济选择, 进而对集体的宏观经济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实, 早在 1983 年, 著名社会理论家 Ernest Gellner 就在其名著《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提出了族群同质性有利于经济成功的经典性命题 (Gellner 1983, cha. 3, 6), 但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确认。很长一段时期, 族群同质性或异质性的经济影响一直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 直到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提出, 亚撒哈拉非洲诸国在诸多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可由这些国家的族群多样性来解释, 并确认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降低效应。这是经济学家从相反的方向对 Gellner 命题的首次直接证明。

但值得细加考量的是, 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是否仅有负效应? Alesina and Ferrara (2005) 提请读者注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即纽约和洛杉矶是美国族群多样性较大且种族关系麻烦最多的两个城市, 但也是最具文化创意和经济活力的城市。因此, 多族群社会中多样性之利与异质之弊究竟对该社会的经济表现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 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

一、族群多样性经济增长降低效应的确认: 区域与全球

一般认为, 关于族群多样性负经济增长效应的开创性研究, 始于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这是一篇分析非洲诸国经济表现的经典论文, 尤其是解释了亚撒哈拉非洲经济增长低水平, 即所谓“非洲增长悲剧”, 其重要发现之一是族群多样性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表现负相关。这篇论文引发了有关“非洲增长悲剧”的跨学科研究浪潮, 其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发现得到了很多后续研究的确认 (Platteau, 2009)。

很快, 就族群多样性是否对经济发展有降低效应, 学界的研究对象从非洲拓展到其他地区乃至全球。Alesina, Baqir and Easterly (1999) 确认族群异质性对于美国城市的经济表现有降低效应。Okediji (2004) 发现, 种族/肤色及其教育差异对巴西各地区民众的收入增长潜力,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国内地区间的差异, 而且表现在更广范围内的跨国差异。

Dincer and Wang (2011) 使用中国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族群分化指标和族群极化指标, 以省级行政地区为分析单位, 考察了族群分化和族群极化对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 族群分化指标和族群极化指标都显著降低了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的经济增长率。

这项研究还在跨国比较的视界中展开。在一项有关政府质量的跨国性 (152 个国家) 比较研究中, La Porta et al. (1999) 提及族群语言异质性与政府治理质量负相关, 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Alesina et al. (2003) 基于全世界 190 个国家的数据, 综合考察了族群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将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基于非洲得出的结论拓展到全球, 并进一步发现, 语言分化度 (linguistic fractionalization) 与经济增长呈现强的负相关关系, 而宗教分化度 (religious fractionalization)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

当然, 族群多样性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并不一定永远是负面因素。Alesina and Ferrara (2005) 构建了一个族群多样性成本收益的理论模型, 其推演显示族群多样性在对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不利影响的同时, 也会因能力、经验、文化的多元化带来某些私人物品产量的提升。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有益的作用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更有可能呈现, 尚需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确认。Sparber (2009) 分析了美国 1980-2000 年间各产业的人口普查资料数据, 发现那些依赖于决策创意和消

费者服务体验的行业（如广告、旅游餐饮休闲、法律服务等）受益于种族多样性，而需要高水平团队努力的行业（多种制造业、交通业、飞机维修行业等）会因种族多样性而受损。可以说，Sparber（2009）为 Alesina and Ferrara（2005）中建构的模型提供了部分实证基础。

此外，不同类型的族群多样性可能会对经济表现造成不同的影响。Montalvo and Reynal-Querol（2005）用跨国数据分别检验了衡量族群多样性的两个指标——“分化指标”（fractionalization index）和“极化指标”（polarization index）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分化指标是指从一个地区随机挑选两人，他们分属于不同族群的概率，假设族群大小相同，则族群种类越多，分化指标越高。极化指标衡量的是不同族群极化或者说势均力敌的程度，当该地区由人数彼此接近的很少几个族群主导时，族群个数越少，极化指标最高。只有单一族群或族群个数很多时，极化指标都较低。在大多数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文献，多采用族群分化度指标。

Montalvo and Reynal-Querol 发现族群分化和族群极化都对经济发展有显著负效应，但不支持之前文献主张的族群分化以增加社会冲突抑制经济发展的机制。同时，他们发现族群极化显著提高了社会冲突（甚至内战）发生的概率并降低了投资。

与此相类似，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还有可能随族群多样性的程度变化而呈现非线性特征。Cerqueti et al.（2012）的动态理论模型显示族群分化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非线性，即高增长出现在族群分化中等的地方，而低增长则出现在族群高度同质或高度异质的地方。但这篇文献有关族群高度同质性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来自模型推演，既与现实世界中诸多明显的实例（例如欧洲早期工业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相背离，也与绝大多数相关文献的看法相左。实际上，这些文献之关注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这一课题，要么预先假定、要么早已确认族群同质性有利于经济发展。

二、族群多样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机制：微观与宏观

如果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确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发生呢？对这个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考察。族群多样性首先会对个体的微观经济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宏观的经济产出产生影响。

（一）微观机制

就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我们至少可以从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认同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找到可能的分析路径。族群多样性可能会增大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尤其体现对契约谈判、订立和执行成本的影响之中；族群多样性可能会增大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损于最优经济活动的开展；族群多样性可使人们的经济决策受制于认同考量，即“成为何种类型的人”（Akerlof and Kranton, 2000: 748），从而丧失更多的达成交易的机会；族群多样性中内生的偏好异质性尤其会体现在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之上，从而有损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更为一般的公共部门的表现。

总体来说，在既有文献中，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微观机制的探讨，比较稀缺，但也比较聚焦。

稀缺性的体现，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认同经济学的视角较少出现在族群多样性的文献之中。这一稀缺性可谓族群多样性文献中迄今为止最为显著的不足。

聚焦性的体现，在于有关微观机制主要是在公共经济学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即认为高水平的族群多样性会引发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尤其体现为诸多生产性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些公共物品既包括实体性基础设施也包括社会性基础设施（主要是教育）。



Alesina, Baqir and Easterly (1999) 建立了一个偏好极化与公共物品提供模型, 并据此使用美国城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族群分化 (ethnic fragmentation) 程度越高的城市, 其生产性公共物品 (如教育、道路、排水和垃圾处理) 提供的公共财政支出越少。

族群多样性对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有负面影响, 这并非一个全新的见解, 但在美国社会科学中对此问题的传统智慧主要缘于对公共教育的研究。事实上, 有关族群多样性对公共教育的影响, 早已成为美国公共管理和教育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 有意思的发现层出不穷。

例如, Pitts (2005) 以美国德克萨斯州学区为分析单位, 研究了种族和族群多样性对公立中学教育的影响, 发现教师多样性对辍学率和考试成绩有影响, 而管理者多样性则没有影响; 但有意思的是, 此文还以学生为基数建构了教师和管理者族群代表性的指标, 发现教师族群代表性与辍学率无关但与学生 SAT 考试表现有关, 而管理者族群代表性则与辍学率和考试表现呈现全面而显著的负相关。

当然, 族群多样性对公共教育的不利影响并不限于美国。Miguel and Gugerty (2005) 发现, 在肯尼亚, 族群多样性既不有利于小学的硬件建设 (如降低小学的筹资水平并使学校的设备更加糟糕), 也有损于小学的软件运行 (如多族群地区的学校委员会对违规家长的惩罚力度大为不足)。

至于族群分化地区为什么在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表现糟糕, Alesina and Ferrara (2005) 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加以分析, 其中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显示出异质性偏好, 进而影响到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模型推演表明, 较高异质性的社会可以在私人物品上展现较高的生产率, 但会使税收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水平相对降低, 其根源在于具有族群异质性的社会共享公共资源的意愿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 有两篇发表在顶级政治学学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论文, 以不同的方法, 对 Alesina-Ferrara 模型进行了拓展, 值得加以重视。Habyarimana et al. (2007) 辨识出将族群多样性与公共物品提供不足联系起来的三组机制, 即偏好机制、技术机制和战略挑选机制, 并通过一系列博弈实验对此进行了检验。此文发现, 族群同质性较高的社会在公共物品提供上的成功可以归因于战略挑选机制, 尤其是在人口规模较小的社会, 相关族群之间可以产生合作性博弈均衡。此外, 技术机制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即技术进步有助于推进社会网络的形成, 并在其中实现社会惩戒的有效行使。但偏好机制, 即偏好或口味的共同性, 或较高度度的利他主义, 对于集体合作的形成和公共物品的提供, 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Baldwin and Huber (2010) 探讨了族群多样性的形式对于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此文将族群多样性归为两类, 即文化差异性和经济差异性, 并基于 46 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以基尼系数度量的族群间收入差异性才是造成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显著解释变量, 而包括族群语言异质性在内的诸多文化差异性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构成显著的影响。这两个研究提示我们, 即便我们将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机制聚焦于公共物品的提供, 但族群多样性影响公共物品提供的机制依然有很多细节尚待厘清。

(二) 宏观机制

与微观机制探索的相对稀缺和相对聚焦相比, 既有文献关于宏观机制的讨论是丰富多彩的。最为显著的是, 族群多样性程度较高会提高族群冲突的概率, 不利于政治稳定和政府施政, 导致国家失败 (state failure), 从而对长期经济表现造成负面影响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除了族群冲突层出不穷、公共秩序荡然无存、政府更迭频密杂乱之外, 国家失败还有更多的制度性和社会性的体现。在一篇有关“非洲增长悲剧”的跨学科文献综述中, Platteau (2009) 确认, 地区性的强族群认同妨碍了现代公民的出现, 非正式社会规范的强大作用削弱了现代法律体系的可信度, 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个人资本积累的社会规范和习俗降低了原住民企业和聚居区的经济表现。总体来说, 族群分化/分割/分裂既是持久不息的国家失败的内生性原因, 也是其内生性

结果，而在国家失败的地方，经济表现自然没有可能获得持续的改善。

国家失败的最惯常表现就是社会冲突的频密。Rodrik (1999) 对 1975–1989 年间 110-118 个国家出现增长崩溃的根源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是其内部社会冲突与外部冲击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其内部冲突管理的制度。其中，以经济不平等和族群分化度来度量的社会分离情形严重的国家，经历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增长率下坠。

国家失败的最严重表现就是引发内战，而内战对经济表现的灾难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族群多样性是否与内战爆发的概率有所关联，就非常相干了。Elbawadi and Sambanis (2002) 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内战爆发决定因素模型，并通过计量分析和社会模拟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族群分化和内战频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内战自然会极大地有损经济发展。但该文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如果当地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即便族群分化水平较高，内战发生的概率也会降低。

Bridgeman (2008) 建立了一个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分析究竟是政府再分配还是冲突/内战构成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的机制，并通过模拟发现，收入降低的最主要根源在于族群多样性引发的再分配而不是族群冲突。但这个模型仅设定了两个族群，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多族群社会，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如此，这一理论分析依然支持了 Elbawadi and Sambanis (2002) 中的一个发现，即在多族群国家，如果政府没有致力于推进普惠众族的经济增长而是致力于在族群间进行再分配，反而会阻滞收入水平的上升。

Tangerås and Lagerlöf (2009) 也建构了一个博弈论模型，分析再分配与族群冲突和内战的关系，发现自我强化型再分配和权利分享型政治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而这种情况在同质性或异质性很高的地方更有可能出现，而在族群多样性中等水平的地方，内战的风险反而较高。这篇文献模型推演的一些结论与常识不大相符，或许这与此文忽视了族群分化与族群极化的差别有关。

可是，族群多样性与族群冲突（以及内战）概率的关系，一直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Paul Collier 认为，对于族群多样性与差经济表现和高冲突风险的关联性，需要加以仔细考察，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族群分化 (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在民主国家一般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族群分化固会降低公共部门的表现，而活跃的民间部门会抵消掉这种不良影响，但在独裁国家，族群分化就会具有破坏性。

可是，无论民主与否，主导性族群的存在都有可能对经济表现产生不利影响，尽管这一效应本身并不强烈。至于内战爆发的风险，也同族群极化而不是族群分化有关。总体来说，只要不出现族群极化，具有族群多样性的社会既能实现社会稳定，也能呈现经济活力 (Collier, 2001)

Collier 的这些结论后来得到了 Kotera, et al. (2015) 的部分支持，尽管此文考察的是族群多样性对社会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影响。此文基于 157 个国家的数据，以国民健康结果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掌政族群的规模对于社会福利的发展水平至关重要，在独裁或拥有主导性族群的民主国家中，族群多样性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呈现负相关，而在没有主导性族群的民主国家两者之间没有单调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族群冲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实也是公共管理学者早就关注的课题。该领域顶级学刊《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Esman, 1997) 指出，公共行政如何在处理族群冲突和促进经济发展上扮演有效的中介性角色，这个重要问题在公共行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研究领域同时受到了忽视，并呼吁相关学者对此课题给予高度重视。

关于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宏观机制，除了国家失败及其在族群冲突甚至内战上的具体表现之外，另一个考察热点在于腐败。相当一部分文献发现，族群分化度高的地方，政府腐败愈甚，而政府腐败在很多情况下会拉低经济增长。在 Shleifer and Vishny (1993) 的模型中，所谓“独立受贿者” (independent bribe-takers) 越多，腐败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更甚。他们的文章提及，在



高度异质性且治理不佳的国家，独立受贿者数量较多，而在那些有警察国家之声、寡头统治或同质性高国家，腐败固然有，但破坏力量弱于异质性高的国家。

Mauro (1995) 试图证明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使用了族群语言多样性指数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偏差，却意外地发现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LaPorta, et al. (1999) 在有关政府质量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研究，提及了族群分化与腐败的关联性。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中的数据分析显示，在非洲国家，1990 年的腐败程度与其 1960 年的族群分化度显著正相关，而对抑制腐败有重要影响的法治水平则呈现显著负相关。

在一篇有关外国援助与寻租的论文中，Svensson (2000) 发现，外国援助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即英文中所谓 windfall gains）容易诱发寻租激励，而族群多样性越高的地方，寻租激励越强。

在 Cerqueti et al. (2012) 的模型中，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是由腐败作为中介的，族群分化性与基于族群的腐败呈现非线性关联，即族群高度同质性和高度异质性都容易导致高腐败，而低腐败出现在族群分化程度中等的地方，而腐败又影响了经济增长。

三、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表现的约束条件：制度和规模

任何影响都是有条件的。对于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约束条件，已有文献论及了政治制度以及人口/政府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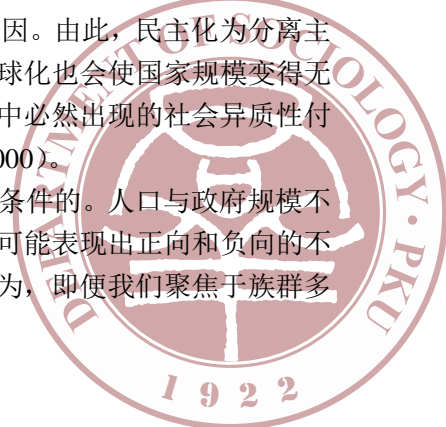
总体来说，族群多样性（尤其是族群极化性）的不利经济影响得到了很多研究的确认，但这种不利影响的发生概率或许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会有所不同。前文提及的 Collier (2001) 论及了民主与独裁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 Collier (2000) 的发现。

Collier (2000) 在民主和独裁的背景下建立一个族群多样性如何影响政府决策在促进增长与实施再分配之间权衡的模型，并以 94 个国家跨时期数据加以检验，发现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破坏性效应只发生在政治权利保障有限的国家，而在民主国家之中这种效应不会呈现。同时，此文还以世界银行在 89 个国家实施的项目为研究对象，发现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所在国家是否民主有关。

然而，对于民主制度会不会抵消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Bluedorn (2001) 注意到了这其中蕴含的内生性问题。民主制度的存在（或良好运行）多发生在族群分裂不严重的地方，因此族群分化与民主运行是互为因果的，即民主制度消弭了族群分化所带来的问题，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民主制度，或者说，弱族群分化让民主制度能够正常运作，而这又反过来消弭了诸多族群相关性问题。此外，他发现，即便在相对来说具有族群同质性的国家，民主制度运行本身也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当把民主制度作为控制变量时，得出的结论需小心处理。

除了政治制度之外，政府规模也会产生影响。Alberto Alesina 及其合作者专门研究在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国家规模（即分裂还是统一）的决定因素，认为管辖地区大带来的好处与人口异质性高引致的成本之间出现的权衡，是导致某些国家出现分裂的根本原因。由此，民主化为分离主义者寻求退出创造了政治条件，而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区域化或全球化也会使国家规模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小国家既能间接地享受大国家的好处，又无需为大国家中必然出现的社会异质性付出代价 (Alesina and Spolaore, 1997; Alesina, Spolaore, and Wacziarg, 2000)。

因此，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以人口与政府规模为条件的。人口与政府规模不同，要素投入量不同，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就有可能表现出正向和负向的不同结果 (Alesina and Ferrara, 2005)。Habyarimana et al. (2007) 也认为，即便我们聚焦于族群多样性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人口规模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国家规模对经济表现的影响,曾经是国际经济政治学中的一个关注课题。经典性的论述是小国家与大国家相比不可避免地蒙受着某些脆弱性,但也锻造了其适应性,因此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反而更有可能欣欣向荣(Katzenstein, 1985; Garrett, 1998)。

Patsiurko, Campbell and Hall(2013)基于30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85-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国家经济表现差异的两大影响因素:国家规模和族群多样性。结果显示,族群同质性的国家要比族群的异质性国家有着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无论是单纯的国家规模还是规模与多样性的交互作用都未对经济表现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或许显示,规模因素或许并不构成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

四、结语: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未来的研究课题

关于族群分化的经济影响,现已成为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中一个方兴未艾的新研究领域。这个方兴未艾的领域产生了一些众所公认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学术挑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加以探索。

第一个挑战,当然,首先在于确认哪一种族群多样性会以何种方式对经济发展造成何种影响。对这一挑战,绝大多数文献确认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降低效应,但究竟是族群分化还是族群极化有此效应抑或两者都有此效应,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此外,绝大多数文献分析的是族群多样性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表现的影响,只有一篇文献研究了族群多样性对美国不同行业发展的影响,发现族群多样性对经济表现并不一定总是呈现降低效应。另有一篇论文基于模型推演认为族群多样性亦有可能对经济表现有提升效应。

总体来说,族群多样性对那些需要较高水平创造力和多样性的行业,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那些需要高水平团队合作的行业有不利的影响。

简言之,有关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确认。在这一点上,更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是在控制诸多因素的情况下,辨识出族群多样性对不同行业发展的影响。

第二个挑战在于内生性问题。在这里,族群多样性与经济表现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性问题固然不可忽略,但遗漏变量偏差(omitted variables bias)的问题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尽管诸多细节尚待厘清,相关理论尚待整合,但经济学家已经确认,经济不平等、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历史遗产(包括殖民影响)、地理条件等是造成经济增长差异的贡献因素(Helpman, 2004: cha. 6-7)。那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是否构成一个新的、独立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抑或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所显示出来的影响只不过是已知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投射而已?

目前,既有的文献大多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了地理因素,从而确认族群多样性是独立于地理因素之外的一个经济增长的外生结构性影响因素。历史遗产和政法制度因素,亦可以加以控制。相对比较欠缺的是对经济不平等的控制。族群多样性属于社会结构性因素,而经济不平等属于经济结构性因素,两者极有可能会相关,因此未来研究的一个着力点是将族群多样性这一社会结构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经济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之中分离出来。

第三个挑战在于发现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表现的机制。对于增长经济学家来说,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在于要素投入的水平,其中包括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变革增速和企业家创新的蓬勃(Aghion and Howitt, 2009)。如果我们能辨识出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独立影响,那么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这一贡献是通过影响哪种要素投入水平而确立的?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文献,对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并没有整合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之中。除了教育之外,既有文献极少深入探究族群多样性对于实体资本投入、



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变革幅度和企业家精神兴旺的影响，而是将影响机制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若干外生变量上，即可在国家失败这一概念涵盖范围内的诸多现象，诸如族群冲突、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甚至内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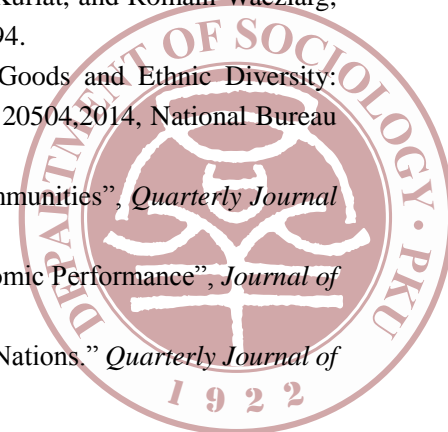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文献聚焦于“公共物品提供机制”，即族群多样性的经济降低效应是通过对公共物品提供的负面影响所传导的。但是，这方面的文献也有缺失。一是相关研究并不细致，如有些研究仅仅分析了族群多样性对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的影响，而没有对地方公共物品的产出情况进行分析；二是公共物品的种类繁多，而族群多样性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亦有可能呈现物品类别专属性，对此所有文献均未留意；三是公共物品提供与经济增长具有内生性，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未有清晰的理论模型加以说明，由此，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公共物品提供机制，尚缺乏基础理论的支撑。

第四个挑战在于，族群多样性本身是由多种类型的因素所构成的，主要包括宗教多样性、语言多样性（互通性）、社会规范差异性、价值观念异质性等，那么族群多样性的哪些构成因素对经济表现产生影响，还需要深究。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将对有关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增长理论中的老大难问题，提供新的破解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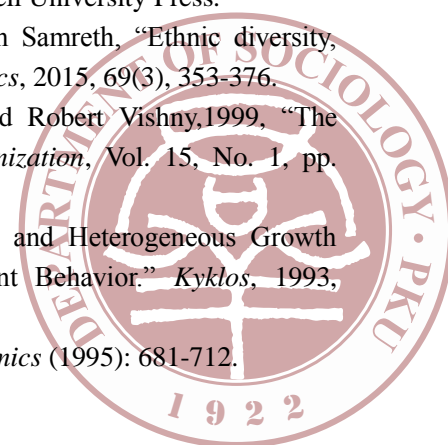
中国是一个多族群国家，而且中国也有丰富的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基于中国的数据，对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展开深入而系统的实证研究，不仅能直面上述的四大挑战，从而在社会科学前沿领域做出学术贡献，而且还能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有助于优化涉及到少数民族的诸多经济社会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 [2] Akerlof, George A., and Rachel Kranton, “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 (3), 715-753.
- [3] Akerlof, George A., and Rachel E. Kranton, “Identity and Schooling: Some Lessons for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4), 1167-1201.
- [4] Akerlof, George A., and Rachel E. Kranton, “Ident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2005, 19 (1), 9-32.
- [5] Akerlof, George A., and Rachel E. Kranton, *Identity Economics. How Our Identities Shape Our Work, Wages, and Well-be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6] Alesina, Alberto, Reza Baqir, and William Easterly, “Public Good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 (4), 1243-1284.
- [7] Alesina, Alberto, Reza Baqir, and Caroline Hoxby,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12 (2), 348-396.
- [8] Alesina, Alberto, Arnaud Devleeschauwer, William Easterly, Sergio Kurlat, and Romain Wacziarg, “Frac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3, 8 (2), 155-194.
- [9] Alesina, Alberto, Caterina Gennaioli and Stefania Lovo, “Public Goods and Ethnic Diversity: Evidence from Deforestation in Indonesia”, NBER Working Papers 20504, 201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 [10] Alesina, A., and E. L. Ferrara, “Participation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 (3), 847-904.
- [11] Alesina, Alberto, and Eliana La Ferrara,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 43 (3), 762-800.
- [12] Alesina, Alberto, and Enrico Spolaore, “On the Number and Size of N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 Economics*, 1997, 112 (4), 1027-5.
- [13] Alesina, Alberto, Enrico Spolaore, and Romain Wacziarg,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 (5), 1276-96.
- [14] Ashraf, Quamrul, and Oded Galor, "The "Out of Africa" Hypothesis,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1 (2013): 1-46.
- [15] Baldwin, Kate, and J. D. Huber. "Economic Versus Cultural Differences: Forms of Ethnic Diversity and Public Good Provi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4 (2010): 644-662.
- [16] Bluedorn, "Can Democracy Help? Growth and Ethnic Division", *Economics Letters*, 2001, 70, 121-126.
- [17] Bridgeman, B, "Why are ethnically divided countries poor?"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8, 30(1), 1-18.
- [18] Cerqueti, Roy, Raffaella Coppier, and Gustavo Piga, "Corruption, growth and 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06 (2), 153-181.
- [19] Collier, Paul, "Ethnici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2000,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2(3), 225-245.
- [20] Collier, Paul, "Implications of Ethnic Diversity", 2001, *Economic Policy*, 16 (32), 129-166.(with Patrick Honohan's, Karl Ove Moene's, and panel discussions)
- [21] Dincer, Oguzhan C., and Fan Wang,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14.1 (2011): 1-10.
- [22] Easterly, William, and Ross Levine,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1997,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4), 1203-1250.
- [23] Elbawadi, I., and Sambanis, N., 2002, "How much war will we see? : Explaining the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 (3), 307-334.
- [24] Esman, Milton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nic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7, 57 (6), 527-533.
- [25] Gellner, E.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 [26] Griliches, Z, "Patent statistics as economic indicators: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0, 28(4), 1661 -1707.
- [27] Habyarimana, James, Macartan Humphreys, Daniel N. Posner and Jeremy M. Weinstein, "Why does ethnic diversity undermin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7, 101(4), 709-725.
- [28] Hall, Robert E., and Charles I. Jone,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 (1999): 83-116.
- [29] Helpman, Elhanan, *The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0] Katzenstein, P.J.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31] Kotera, Go, Nobuhiro Mizuno, Keisuke Okada, and Sovannroeun Samreth, "Ethnic diversity, democracy, and health: Theory and Evidence",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15, 69(3), 353-376.
- [32] La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9,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15, No. 1, pp. 222-279.
- [33] Leff, Nathaniel H. and Kazuo Sato, "Homogeneous Preferences and Heterogeneous Growth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Saving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Kyklos*, 1993, 46(2):203-223.
- [34] Mauro, Paolo, "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681-712.



- [35] Miguel, Edward, and M. K. Gugerty. "Ethnic diversity, social sanctions, and public goods in Keny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s 11-12 (2005): 2325-2368.
- [36] Montalvo, Jose G., and Marta Reynal-Querol,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6.2 (2005): 293-323.
- [37] Okediji, Tade O, "The dynamics of race, ethni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razilian experienc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3 (2004) 201-215.
- [38] Patsiurko, Natalka, John L. Campbell and John A. Hall, "Nation-State Size,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13, 18(6), 827-844.
- [39] Pitts, David W. "Diversity, Repres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about Race and Ethnicity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15.4 (2005): 615-631.
- [40] Platteau, Jean-Philipp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to Af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e, ethnicity, and custo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1 (2009): 669-689.
- [41] Rodrick, D. (1999), "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Collaps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 (4), pp. 385-412.
- [42] Svensson, Jakob, "Foreign Aid and Rent-seek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51 (2), 437-461.
- [43] Shleifer, A., and R.W. Vishny, "Corrup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 (3), 599-617.
- [44] Sparber, Chad, "Racial Diversity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in U.S. Industries: 1980-2000",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9, 75 (3), 829-856.
- [45] Tangerås, Thomas P. and Nils-Petter Lagerlöf, "Ethnic Diversity, Civil War and Redistribu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11 (1), 1-27.

【论 文】

反思与检讨：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规范化的若干基本问题¹

王 平²

摘要：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冲击，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凝聚力建设，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当务之急。通过辨析“中华”、“华夏”、“民族”等概念的基础上，以进一步厘清“中华民族”的涵义演变过程，并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狭隘化”、“他者化”和“虚无化”等错误倾向的实质，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规范化；民族虚无主义

2014年9月28-29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¹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第56-62页。

² 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